

# 荆州“息壤”传说的文化解读

李义芳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荆州有丰富的“息壤”传说资料。“息壤”传说反映了民俗信仰生成、演化的轨迹。看似荒诞的传说实际上是民俗宗教的一种表现形式,体现了古人的宇宙观和他们对自然界的认识。

**关键词:**“息壤”传说;文化解读;民俗宗教

**分类号:**K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19)04-0040-05

鲧禹治水神话是中国式的创世神话,“息壤”是鲧禹创世的原始材料。荆州地区至今仍流传着大禹治水和“息壤”的传说,据说它还与沙市和荆州地名的来源有关。传说大禹治水,来到荆沙地区,将息壤投在了沙市的龙门河口和荆山之侧,这里逐渐形成陆地,开始有人类繁衍生息。<sup>①</sup>对传说中鲧禹治水所用的“息壤”,学界从神话学、历史学、民俗学、地质学和生物学等多种角度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sup>②</sup>其中周延良在《鲧禹治水与息壤的原始文化基型》一文中认为,“息壤”神话的原型是原始“活土”观念,从“活土”到“息壤”经历了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变体过程。<sup>③</sup>那么,活土观念演变为祭拜替代符号“息壤”后,又是以何种形式传承的?它又是如何作为神性偶像进入宗教殿堂的?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荆州“息壤”传说作为研究对象,对“息壤”传说的文献进行梳理,通过分析文献作者的身份及社会背景、文本故事的结构及涵义,试图探究传说背后隐藏的宗教世界观。

## 一、荆州“息壤”的民间传说

荆州“息壤”传说由来已久。根据《山海经》《淮南子》等记载,“息壤”乃鲧禹治水所用之物。传说鲧禹父子用来治水的“息壤”散落在湖北、湖南、安徽和四川等地。<sup>[1](P206)</sup>湖南永州的息壤,因唐柳宗元作《永州龙兴寺息壤记》而闻名。安徽徐县的“息壤”出自《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汉元帝时,临淮徐县地泳长五六里,高二丈,即‘息壤’之类也。”笔者在文中重点探究湖北荆州的“息壤”传说。荆州“息壤”传说始于何时,无从考证。目前有据可查的较早的文献是《溟洪录》,记载如下:

江陵府南门有息壤焉。唐元和中,裴宙牧荆,掘地得石,状与江陵城同,径六尺六寸,徙弃之。时阴雨弥旬不止。有道士欧阳献云:若作一室瘞之,雨当止,宙惊曰:前日弃藩篱下者,是也,如献言而霁。<sup>[2](P1221)</sup>

《溟洪录》是前宋志怪小说集,作者不详,所记息

**收稿日期:**2019-05-01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荆州水灾与洪水文化研究”(17D030);长江大学楚文化研究院开放式基金项目“荆州神话传说、民间歌谣与历史记忆”(CWH201606)

**作者简介:**李义芳(1967-),女,湖北潜江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荆楚文化研究。

① 参见沙市群众艺术馆:《沙市民间传说故事集》,1984年版第2~3页。

② 吕威在《息壤研究》一文(载《中国文化》第十四期),对国内息壤研究做了综述,其中代表作有:萧兵的《中国与美洲的息壤》、叶舒宪的《从“盘古之谜”到中国原始创世神话之谜》、李道和的《昆仑:鲧禹所造之大地》,均从神话学角度研究。另外,田兆元的《大禹治水故事背后有什么秘密》一文运用民俗学方法进行研究。顾颉刚的《息壤考》和王子今的《“息壤”神话与早期夏史》这两篇文章从历史学视角研究,罗漫的《“息壤”与澎湖土:一个文化之谜的科技考察》则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

③ 参见周延良:《鲧禹治水与息壤的原始文化基型》,《文艺研究》1998年第6期。

壤故事发生在唐元和中期,即晚唐时,息壤为“状与江陵城同”之石,即江陵城的模型,具有止水之神性。

北宋初年李昉等撰《太平广记》转录《玉堂闲话》佚文云:

江陵南门之外、雍门之内东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高尺许,具体而微。询其州人,曰:此息壤也。鞠其由,曰:数百年前,此处忽为洪涛所漫,未没者二三版。州郡惶惧不知所为。忽有人白之曰:州之郊墅间有一书生,博读甚广,才智出人,请召询之。及召问之,云:此是息壤之地,在于南门。仆读息壤记云:禹湮洪水,兹有海眼,泛之无恒。禹乃镌石造龙之宫室,寘于穴中,以塞其水脉。后闻版筑此,毁其旧制,是以有此怀襄之患。请掘而求之。果于东垣之下掘数尺,得石宫室,皆已毁损。制帅于是重葺,以厚壤培之,其洪水乃绝。今于其上又起屋宇,忘其处所。旋以息壤记,验之不谬。<sup>[2](P1221)</sup>

《玉堂闲话》的作者是唐末五代时文人、官员王仁裕,其中作品大都散佚,因被《太平广记》所收录而行世。文中所记与《溟洪录》有所不同。知晓“息壤”之处的人由“道士”变为“书生”。作为“息壤”符号的“石宫室”已遭“毁损”,需要“重葺”“以厚壤培之”,其止水功能才得以恢复,说明息壤祠已废弃很久。废弃的原因不明,可能是修筑荆州城时被毁坏,抑或是久未遇水旱灾害,息壤逐渐被人遗忘。文中提到了“甕门”,孔自来《江陵志余》“甕门”条云:“外栅南门也。……今无此门,而息壤之迹亦在西垣。古今郭门迁改不常也。”说明在城墙之外又建有栅城,即荆州城有罗城和子城,息壤的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这从侧面证明修筑城墙对息壤造成了毁坏。相对于《溟洪录》的记载而言,《太平广记》中的息壤外形和大小都发生了变化,即变矮变小了。但息壤镇水脉、止洪患的神性与前说一致。

北宋除了《太平广记》收录《玉堂闲话》之息壤篇外,苏轼、苏辙兄弟均作《息壤诗》以记之。其中苏轼诗序云:

今荆州南门外有状若屋宇陷入地中而犹见其脊者,旁有石,记云:不可犯。畚鍤所及,辄复如故。又颇以致雷雨,岁大旱,屡发有应。予感之,乃为作诗。<sup>[3](P54~55)</sup>

此序中记载息壤的位置和形状与《太平广记》所记一致,即“南门外”,但此时息壤位于地下,且旁边多出一块石碑,上书“不可犯”三个字。息壤具有自我还原的神性,而且增加了导致“雷雨”的止旱功能。

南宋记载“息壤”传说的文献比较多,有史学家罗泌著《路史》及其子罗苹作《路史注》,孝宗时人编纂的类书《锦绣万花谷》,李石撰《续博物志》,张世南撰《游宦纪闻》,范成大撰《吴船录》等。其中,除《路史》和《路史注》所记内容有所增补外,其余书籍和《溟洪录》所记大同小异。《路史》成书于南宋乾道年间,记述自三皇五帝至东汉末年之事,作者出身“史学世家”,以擅长治史闻名于世。他这样记“息壤”:  
“息生之土长而不穷,故有息石”<sup>[2](P1220)</sup>;  
“江陵之壤锁城镇水旱。昔高从海镇渚官,出经其处,问书记孙光宪。对以伯禹治水,自岷至荆,定彼泉原之穴,虑万世下或有泛滥,爰以石屋镇之。本之《溟洪录》裴相欧献之事也。王子融修臧丙之事,雷雨骤集,爰屋而记之,贻救留者焉”<sup>[2](P1222)</sup>。

对此,其子罗苹注曰:

庆历甲申,尚书郎王子融莅渚官,自春不雨,遍走群祀。五月壬申,与郡僚及此,以今地无复隆起,而石屋檐且露,请掘取验,虽致水珍,亦足为快。因具畚鍤置土数百担,以俟从事。旦从事,是夕雷雨大至,远近沾洽,亟以馨俎荐答。医博士张若水者,年逾七十,因言儿时见臧大谏丙,尝以久旱,发之数尺,巨石如屋,四面为柱为牖,其南隐出门闕之象,百夫莫动,乃縻以巨索,率水咒二百踏出之,大雨而止,未及穷其石城者,因覆以屋,后更加敝累坛绘为风雷佛之像,陈尧佐易以龙神。皇祐二年,子融致仕,始为记,俾漕吕刻石置之。<sup>[2](P1222)</sup>

罗泌称“息壤”为“江陵之壤”,具有“锁城镇水旱”之功能,是当年伯禹为镇“泉原之穴”留下的。其子罗苹举“庆历甲申”即宋仁宗四年(1044)之事予以证明,说当年江陵大旱,掘息壤导致“雷雨大至”,验证了息壤镇旱功能,且对息壤的描述更为具体,“巨石如屋,四面为柱为牖,其南隐出门闕之象,百夫莫动”,需二百头水牛才能拉动,可见息壤之大之重。且“息壤”已经由过去的“石屋”演化为“风雷佛之像”或“龙神”。《游宦纪闻》云:“江陵城内有法济院,今俗乎为地角寺,乃昔息壤祠。”可知南宋嘉定年间,息壤祠已变为法济院(或地角寺)。

元朝没有相关记载。明代有雷思霈《荆州方輿书》、孙能传《益智编》(下)、谢肇淛《五杂俎》,以及清初王士禛《香祖笔记》、钮琇《觚剩》、孔自来《江陵志余》等对息壤有相似记载。其中《荆州方輿书》几乎只是对宋以前的记载进行了综述,唯一不同的是指出了当时息壤遗址已被世人遗忘,直到万历壬午年

(1582)在修筑南门城墙时,人们才重新发现息壤,并在上面建筑了息壤祠。《香祖笔记》的记载有些新意:“荆州南门有息壤,其来旧矣,上有石记云:‘犯之颇致雷雨。’康熙元年,荆州大旱,州人请掘息壤出南门外堤上。掘不数尺,有状若屋,而露其脊者。再下尺许,启屋而入,见一物正方,上锐下广,非土非木,亦非金石,有文如古篆,土人云:‘即息壤也。’急掩之。其夜大雨,历四十余日,江水泛滥,决万城堤,几坏城。”<sup>[4](P61)</sup>根据王士禛的记载,“息壤”位置发生了变化,不是在子城瓮门内,而是位于南门外堤上,而且第一次把“息壤”和护城堤联系起来。“息壤”形状也发生了变化,为一正方形物体,结构很奇特,质地“非土非木非石”,石记上的内容是“犯之颇致雷雨”,没有提及镇旱功能。

上引记载“息壤”传说的文献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志怪杂事小说或笔记体小说,对“息壤”以寓言或传奇故事的形式加以记载,看似荒诞怪异,写作目的带有明显的娱乐性。另一类是地理类图书,作者把“息壤”传说当作历史来书写,所记时间、地点及人物都是真实的。两类文献对“息壤”传说记载虽有差异,但共同点也非常明显。他们都认为传说内容是真实的,“息壤”具有止水镇旱的神性,位于江陵(或荆州)城南门。

对“息壤”的神性,古人早已提出质疑。如唐代柳宗元对永州息壤致人死的说法给予了理性的分析:“南方多疫,劳者先死,则彼持锸者,其死于劳且疫也。土乌能神?”可后世为什么还深信不疑,且代代传诵?传说背后究竟反映了怎样的历史真实?围绕这一问题,笔者进行了探讨。

## 二、“息壤”传说与民俗信仰

“传说是一种将确信为过去发生的事情与具体的事物联系起来进行讲述的故事形式,这些故事在传承中间被确信为是真实的。因此,传说与平民的信仰、对自然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sup>[5](P99)</sup>鲧禹治水和“息壤”传说与楚人的山石信仰联系密切,两者融合并逐渐演化为民俗信仰。这种信仰以人们看不见的宗教形式存在,起源于原始信仰,创立式宗教(佛、道等)的教义、礼仪融入其中,在社会生活中被人们运用。

古人认为“土精为石”,故“息壤”别称息土、息石。在荆州的传说中,“息壤”均为石状,名义上是“息壤”,实际是息石。息石是楚人对山石崇拜的演化。“对山的崇拜往往和对石的崇拜相联系。首先

是人们敬奉那些奇异的巨大的山岩之石。以后随着人们利用和制造石器,或从石块中取火、取金属,对石的崇拜逐渐加深,以至于把巨大的岩石雕制成神佛偶像加以膜拜,形成了对于石神、石像崇拜的演化。”<sup>[6](P44)</sup>徐文武认为,楚人有山川神灵信仰,且山神与水神合一。<sup>[7](P215~218)</sup>楚人山川崇拜的核心内容是祭祀和祈祷,以祭祀来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楚人祭祀山川神灵最常用的祭法是“瘞”,即把祭祀山神的祭品深埋。《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楚共王为选王位继承人,“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于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于是将玉璧埋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齐,而长入拜”<sup>[8](P311)</sup>。这里祭拜山神的祭品是玉石,以祭拜掩玉祈求神灵帮助确立嗣子。

湖北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出土了一件漆盾、一笱泥土(“遣策”上记为“溥土”)。李家浩认为,这件以龟腹甲为外形、上绘治水神人禹、契神像的漆盾是一件镇水神器,“溥土”即“敷土”,也就是禹治水用的息土(或息壤),“该墓把‘溥土’与绘有禹、契神像的龟盾同置于椁室之内,显然其用意是镇治水,或者是防御水的了”<sup>[9](P65)</sup>。可见,楚人很早即以息壤镇洪水。传说荆州地方遇到久旱不雨或霖雨不止时,以祭祀“息壤”来镇旱止水,是楚人巫术的延续。传说从禹开始,祭祀“息壤”的方式即为“镌石造龙之宫室,寘于穴中,以塞其水脉”(《玉堂闲话》)。之后或“作一室瘞之,雨当止”(《溟洪录》),或“从道士欧阳献之谋,复埋之,祭以酒脯,而水止”,或者“从之,既瘞。祭之,夕复隆起”(《路史注》)。与楚人祭祀山神的“瘞”法相同。《吴船录》《路史注》和《觚剩》分别记述唐元和中年、宋庆历甲申年和康熙乙丑年因掘息壤致大雨不止之事。起初,地方官员没有主动祭祀“息壤”的意识,只是在遇到灾情无法解决时,在身边人提议下才去祭拜“息壤”,而且祭拜仪式非常简单,以至于文献都没有详细记载,仅用“祭以酒脯”“祭之”等寥寥数语一笔带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息壤”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从过去不得已而为之变为重视“息壤”神性,并以一定仪式来祭拜。根据《玉堂闲话》的记载,“息壤”位于南门外的一所“小瓦堂室”之下,没有任何标志,作者向当地人打听,才得知此处为“息壤”所在之地。到了南宋初期,因为遭遇旱情,“则郡守设祭掘之”,庆历甲申(1044)因掘动息壤而解旱情,则“亟以馨俎荐答”,“后更加敝累坛绘为风雷佛之像,陈尧佐易以龙神”。此即为一种有意



识的祭祀活动,实现了“息壤”祭拜与佛道宗教的融合。明万历中期在南纪门外古息壤地建禹王宫。“乾隆五十七年,知县杨玠监修。光绪元年,文蔚捐建享殿,接砌石台。”<sup>[10](P684)</sup>殿内“奉大禹像”,成为地方文武官员“春秋祀事”和游客参拜的场所。这一过程完成了从民间传说到民俗信仰的演化,也就是从口头叙事发展为行为模式,从表层语言演化为深层民俗心理。

民俗宗教虽然不像创制宗教有明确的创始人,但也离不开人为因素的影响。“从传说到信仰的过程,是口头叙事影响人们行为,口承文学积淀为民俗心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传说独特魅力以外,还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诸如宗教、国家等人为政治的干预。因此,从传说到信仰的文化运动既有民众不自觉的创作,又有上层文化精英的有目的的改造。”<sup>[11](P14)</sup>“息壤”信仰也是如此。前述“息壤”传说的作者都受过良好教育,大部分都是进士出身,在政府为官,是上层社会精英。《太平广记》主编李昉甚至三入翰林,两拜宰辅,《宋史》专门为他立传。《太平广记》是奉宋太宗之命编撰而成,代表官方意志。如果没有《太平广记》对《玉堂闲话》中的很多佚文予以收录,“息壤”传说恐怕就会失传。前面已经提到,在所有记述“息壤”传说的文献中,有一类是志怪小说,他们记述“息壤”传说的目的或许是娱乐,但他们对“息壤”的神性是确信的,尤其是到了南宋罗泌写《路史》时,“他对《山海经》所记的‘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的‘息壤’又信为实有,在《余论十·息壤》里举出多种例证以证成之……这无疑便相信了‘鲧窃息壤’那段神话是真有其事”<sup>[12](P350)</sup>。他儿子罗莘在给《路史》作注时,更是对“息壤”传说深信不疑,并举“庆历甲申尚书郎王子融莅渚官”事例和“医博士张若水”的讲述予以证实。一代又一代文人对“息壤”传说的记述和演绎,使“息壤”传说得以传承,并深入人心转化为信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传说背后保留了早期的山川崇拜,再现了人们在遇到严重灾情时寻求“息壤”保护的情节。没有早期信仰就没有传说的产生,没有原始信仰退化为民俗信仰的维系,传说也就不能发展。虽然古老的山川信仰在慢慢消退,但民俗信仰却继续维系着民间传说的传承和发展。“息壤”传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俗信仰生成、演化的轨迹,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当人在灾难面前无能为力时,人们便寄希望于超自然的神的帮助,于是形成原始信仰,随着原始信仰不断传奇化、模式化和

人格化,叙事传说便诞生了。“从信仰到传说的过程复杂而漫长,但是信仰的人格化则是信仰民俗发展为传说的关键。”<sup>[11](P12)</sup>从活土到“息壤”再到风雷神、大禹像,正是信仰人格化的过程,也是传说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 三、“息壤”信仰的宗教世界观

神话中的“息壤”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荆州传说已将“息壤”具体化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形象,即与荆州城形制相同的“石城”。《游宦纪闻》引《溟洪录》云:“唐元和中,裴宙牧荆州,掘之深六尺,得石城,与江陵城同制,中径六尺八寸。”《太平广记》记其在“江陵南门之外,甕门之内,东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高尺许,具体而微。……果于东垣之下,掘数尺,得石宫室,皆已毁损”。《锦绣万花谷》中记载:“江陵南门外甕门内东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高三尺许。”《五杂俎》记载:“康熙元年,荆州大旱,州人请掘息壤出南门外堤上。掘不数尺,有状若屋,而露其脊者。再下尺许,启屋而入,见一物正方,上锐下广,非土非木,亦非金石,有文如古篆,土人云:‘即息壤也。’”《荆州方輿书》也记有“后人掘地得石,其状与江陵城同”。袁宏道《荆州修复北城记》引《溟洪录》和苏轼有关息壤记载时,没有提及南门外有息壤,把息壤直接表达为“石室”,系唐代元和间荆州裴宙所掩埋,是对江陵城的“规度”:“唐元和(笔者注:“和”,原文为相,误)中裴宙(笔者注:“宙”,原文为宇,误)瘞石室,后人掘得,其状与江陵城同。而苏子瞻亦言,江陵南门外,有石状若宇,陷于地中而犹见其脊。近世缮南城,乃得之,故识者谓此城规度,似有所受。更阅时代,未敢则增减。”<sup>[13](P44~45)</sup>

“息壤”信仰背后潜藏的是古人的宇宙观,是对自然界天地河湖形成的一种认识。神话中的“息壤”本是原始土壤,最终生成大地,因此在后世,“息壤”又被认同于大地本身,并被依据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将其改造为方形之物。屈原《天问》中将“圆则九重”与“地方九则”相对应,可见战国时传承着天圆地方的传说。后来“息壤”就已成为微缩的大地模型。<sup>[14](P74)</sup>建筑史学家和宗教学家认为,人类早期的城市布局和房屋结构,均是模仿想象中的宇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世界观,具有宇宙论的性质。因为息壤具有治水功能,所以古代人便在建筑物下瘞埋或建息壤祠,供奉城关之象的石制息壤模型,以镇洪止雨。

以“息壤”镇水脉,这反映了古人对荆州城东南

地势低、濒临长江的地理特点的认识和对陆地、高山和湖泊形成的一种认识。“江陵城地东南倾,故缘以金堤,自灵溪始。桓温令陈遵造,遵善丁防工,使人打鼓,远听之,知地势高下,依傍创筑,略无差矣。”<sup>[15](P2863~2864)</sup>江陵城西北、东北和北部分布着龙山、八岭山、纪山、马山、东山、西山、岳山等,城外和城内水系均由东南方向入江。从风水学的角度看,古城南门附近有泄露地气之虞。因此,这里不仅有“息壤”,而且很早就修筑了护城堤。东晋永和年间(345~356),桓温督荆州军事、任荆州刺史期间,令部下陈遵修筑了金堤。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中有“缘城堤边,悉植细柳”的描述,表明金堤绕江陵城而筑,且距城不远。护城堤具有和“息壤”同样的抵御水患的功能。《晋书·殷仲堪传》记:太元十七年(392),“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数千家。以堤防不严,降号为宁远将军”。殷仲堪因为护堤不力,大水破堤灌城,江陵数千家惨遭水害,他本人也被“降号”处罚。南宋乾道四年(1168)江陵城再遇大水,“水溢数丈,既坏吾堤,又啮吾城,昼夜洞,如叠万鼓”。金堤遭到毁坏,“汇为深渊,不可复筑”,于是五代荆南知府张孝祥“亲督吏士别筑堤城”,是为寸金堤。《香祖笔记》记“息壤”在“南门外堤上”,说明“息壤”与护城堤功能合二为一了。

“息壤”传说中提到了“海眼”和“水脉”。对此,黄芝岗先生早有研究,他认为“地脉”是中国人对于大地的一种奇特解释:“洞庭地穴也,在长沙巴陵。今吴县南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潜行水底,云无所不通,号曰‘地脉’。”(《山海经》郭璞注)在古人的想象里,“地脉像冰块一样,是浮在洪水上的;大的冰块是‘浮州’,小的冰块是‘浮山’。‘浮山’在洪水里会随水消长,……整块的大地有时会因洪水沦为湖泽”<sup>[16](P141)</sup>。这里的“海眼”实际是现代地质学上的“管涌”。《地质辞典》中记载:“管涌又称潜蚀,指地下水在土层中的渗滤侵蚀作用。这是由于在某些土层,存在可以使溶解的物质或颗粒状物质通过的细小洞穴、管道等缘故。特别是在产生渗漏的坝基下,地下水沿小洞穴、管道等渗流,并带走坝基的土壤物质,危及坝体安全。”地面上的漏眼,“镇海眼”便

是使用东西将漏眼塞住。古代江陵有“八角井”:“井下有海眼通江,观泉水之增减,识江流之消长,后人作石塔镇之。”<sup>[17](P143)</sup>江陵古城南门外有“海眼”,故“禹乃镌石,造龙之宫室,置于穴中,以塞其水脉”。后来荆江河道变迁,主泓道远离荆州城门,即“海眼”南移,于是五代荆南知府张孝祥废弃“金堤”,“别筑”寸金堤。这从侧面解释了南宋和明清时期“息壤”传说盛行的原因:一方面荆州城周围的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荆江一改过去散漫状态,形成主泓道,海眼位置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因为人口增长,垸堤增筑,造成荆江水流不畅,水患严重而频繁。于是人们开始寻求宗教的保护,试图依靠宗教来解决挫折和苦难。

总之,荆州“息壤”传说看似荒诞离奇,其实它传承的是原始山川信仰,并进一步演化为民众的“息壤”信仰,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发挥作用。“息壤”传说依托“息壤”信仰而存在,“息壤”信仰沉淀到人们的生活当中,更多的是历史表达功能和文学愉悦特性。

#### 参考文献:

- [1]袁珂.中国古代神话[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2]陈诗.湖北旧闻录(第5册)[M].武汉:武汉出版社,1989.
- [3]苏轼.苏轼诗集合注(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4]王士禛.香祖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5](日)宫家准.日本的民俗宗教[M].赵仲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6]乌炳安.中国民间信仰[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4.
- [7]徐文武.楚国宗教概论[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
- [8]杨伯峻,蒋冀骋.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8.
- [9]李家浩.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龟盾”漆画试探[J].文物,1974(6).
- [10]倪文蔚.荆州府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 [11]林继富.神圣的叙事——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互动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1).
- [12]袁珂.中国神话史[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 [13]袁宏道.袁中郎全集(上)[M].上海:大方书局,1935.
- [14]吕威.“息壤”研究[J].中国文化(秋季号),1996(2).
- [15]酈道元.水经注疏(卷34)[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 [16]黄芝岗.中国的水神[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 [17]孔自来.江陵志余[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

责任编辑 刘春丽 E-mail:157476703@qq.com